民国时期初中国文教科书选文：历程、经验及其启示

李　涛

（西华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四川 南充 637002）

摘　要：民国时期，初中国文教科书作为国文教育的重要载体，因顺应时代的发展需求而获得了较快的发展。而选文作为国文教科书质量的关键部分，在这一阶段先后经历了文言为主的发轫时期、文白混编的探索时期和文白合编的定型时期。在这一过程中，各大出版机构在将选文编进教科书时，不仅充分地考虑了选文的作者群体、内容深度和编排设计，而且还始终遵循着学生的身心特点和教学的基本规律。这些成熟的编撰理念和实践智慧，时至今日仍然适用。因此，探讨这一时期初中国文教科书选文的演进历程与成熟经验，或可为当前语文教材选文的编写提供一些有益的镜鉴与启示。

关键词：民国时期；国文教科书；选文；经验；启示

中图分类号：G6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217（2025）04-0132-07

收稿日期：2025-05-10

基金项目：西华师范大学博士科研启动项目：（2023SE002）清末民国中小学语文教育学术思想的嬗变研究（1904-1949）。

作者简介：李　涛（1988-），男，四川达州人，西华师范大学教育学院讲师，教育学博士。

DOI:10.16284/j.cnki.cn37-1401/c.2025.04.008

选文是语文教科书对文化的选择与传承的重要呈现样式。[①] 民国时期，选文作为初中国文教科书的主体部分，其质量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教科书的出版发行和使用效果。为此，各大出版机构对教科书选文的择选和编撰都特别重视，它们一方面积极聘请教育家和文学家，组成专门的编撰队伍，编撰出版新式的初中国文教科书；另一方面也在各大教育会议和学术平台上不断探讨选文编撰的新秩序和新规范。因此，累积了许多成熟的编撰理念和实践智慧。然而，目前学界对于这一时期初中国文教科书的研究，大多聚焦在文本内容、编撰理念和历史影响上，而对于选文的演进历程、相关标准及其实践经验的研究却尚显不足。因此，对这一时期初中国文教科书的选文进行细致梳理和深入研讨，或可为当前初中语文教科书的编选提供一些有益的镜鉴和启示。

一、民国时期初中国文教科书选文的演进历程

民国时期，初中国文教科书的选文主要有传统的文言文和新式的白话文。然而，由于不同阶段的社会背景和时代需求，文言文和白话文的选文数量在这一时期也呈现出不同的演进轨迹。具体而言，主要有三个阶段：即文言为主的发轫时期、文白混编的探索时期和文白合编的定型时期。

（一）文言为主的发轫时期（1912—1919）

民国初期，中学阶段并没有初级和高级之分。这一时期，由于教育体制的过渡和变革，清末时期中学通行林纾的《中学国文读本》、吴增祺的《中学国文教科书》仍在使用。由于这两套教科书的选文多是从《古文辞类纂》、《四书五经》中选取，所以在体例上仍属文言编撰模式。但为适应壬子癸丑学制和民主共和的教育宗旨，教科书编撰者在选文的册数和内容上做出了相应的调整，如将原先的五册缩减为四册，并删除了大量清代的奏折和祭文。虽然重订教科书得到了大量的使用，但编撰新式的中学国文教科书已势在必

①吴婷婷：《百年语文教科书选文文化分析——基于清末、民国时期、现代三套语文教科书选文的比较》，《课程·教材·教法》2018 年第 7 期。

行。于是，各大出版机构纷纷组织相关的社会学者和专业人员，开始编撰了一批新式的中学国文教科书。如刘法曾、姚汉章编的《中华初中国文教科书》(1912)，林纾、许国英编的《重订中学国文读本》(1913)，陆基、赵钲铎编的《中学新国文》(1913)、谢蒙、范源廉等编的《新制国文教本》(1914) 等。这些教科书的选文既涵盖了书信、契约、论说、史传等多种文言应用文本，也精选了部分诗词、散文、小说等等文言欣赏文本的名篇佳作。

(二) 文白混编的探索时期 (1920—1928)

民国中期，新文化运动爆发后，随着白话文运动兴起和国语教育的发展，众多学者普遍认为在中学国文教科书中选入白话文，不仅有助于宣传新思想、新知识和新道德，而且更容易被中学生接受和理解。1920 年 4 月，教育部也通告全国，要求至 1922 年国民学校原先采用的文言教科书一律废止，各科教科书均需采用语体文。其中，南开大学洪北平、何仲英编的《白话文范》和中华书局朱毓魁编的《国语文类选》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这两套教科书的问世，打破了当时文言选文独占中学国文教科书的局面，也使得人们不得不面对眼前的现实："即要么打开大门，让出一块地，请白话文入内；要么依然将其拒之门外，与白话课本进行斗争，坚决抵制它进入自己的领地；要么与其并行不悖。"① 根据统计，在 1920 到 1928 年间，初中国文教科书的选文类型主要有三种形式：第一种，完全为语体文，如孙俍工、沈仲九的《初级初中国语文读本》，沈星一的《初级国语读本》；第二种，完全为文言文，如沈星一的《初级古文读本》、庄适的《现代初中教科书国文》；第三种，文言和语体混编，如顾颉刚、叶绍钧等人的《新学制初级初中国语教科书》、秦同培的《初级初中适用言文对照国文》、国立北京师范大学附中的《初级国文读本》和北京孔德学校的《初中国文选读》等。由此可见，文白混编的选文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广泛的认可。由于这种形式尚属初创，所以在教科书中的呈现形式也多种多样，如在多篇文言选文之后，附以少量语体文；或以文言选文为主线，将语体文穿插其间；或将同一选文的文言文和语体文进行对译。显然，不管是何种形式，都反映出编撰者对这两种文体的重视。

(三) 文白合编的定型时期 (1929—1949)

民国后期，语体文在初中国文教科书中的占位已基本稳定，人们已不再关注初级中学国文教科书中是否选取语体文的问题，而是更多地对语体文和文言文的合编占比进行深入探讨。在经过几番激烈的争论之后，1929 年教育部颁布了《初级初中国文暂行课程标准》："该标准明确规定初级初中国文教科书语体文和文言文在初中一、二、三年级的比例递次为七与三、六与四、五与五。"② 这一政策颁布后，编写者们均按照这种文白比例来编撰教科书，比如朱剑芒的《初中国文》(世界书局，1929)，朱文叔的《新中华教科书国语与国文》(中华书局、1929)，傅东华、陈望道的《基本教科书初中国文》(商务印书馆，1931)，王伯祥的《开明国文读本》(开明书店，1932)，叶楚仓等《初中国文教科书》(正中书局，1934) 等。但在编撰的过程中也有更为细化的设定，如在朱剑芒的《初中国文》的编辑纲要中，除了对选文的文白比例进行说明之外，还特别指出："本书各册中古语文，略依时代排列，第一册依现代为限，第二册依清代为限，第三册依明代为限，第四册以宋代为限，第五册始由唐代上溯至两汉。第六册兼采周秦间的作品，庶使读者由今及古，于各时代语文上的特质，易于探讨。"③ 除了各大出版机构在编撰时对初中国文教科书的文白合编比例进行完善之外，1936 年和 1940 年颁布的初级初中课程标准也对初中国文教科书的文白合编作了一些补充，如 1936 年《初级初中国文课程标准》中提出："第一学年所选文言文文字尤应与语体接近，以期语体文言之逐渐沟通。"④ 1940 年《初级初中国文课程标准》中规定："甲组第一学年选习之二小时，侧重文言文。"⑤ 这些新规

---

①郑国民：《从文言文教学到白话文教学—我国近现代语文教育的变革历程》，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年，第 121 页。

②课程教材研究所：《20 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汇编语文卷》，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 年。

③朱剑芒：《初中国文》，上海：世界书局出版社，1929 年，第 3 页。

④课程教材研究所：《20 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汇编语文卷》，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 年。

⑤课程教材研究所：《20 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汇编语文卷》，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 年。

定的颁行，不仅为各大出版机构在编撰初中国文教科书时提供了政策导向，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教科书内容在文白合编方面的科学性和规范性。

二、民国时期初中国文教科书选文的历史经验

民国时期，各大出版机构在将选文编进初中国文教科书时，不仅充分地考虑了选文的作者群体、内容深度和编排设计，而且还始终遵循着学生的身心特点和教学的基本规律。

（一）选文群体的多元构成

民国时期，出版社在编撰初中国文教科书时，特别注重选文群体的多元构成。具体而言，这种多元构成主要有两点：一是选文编者的多重身份，二是选文作者的多样来源。两者相互配合，共同塑造了民国时期国文教科书选文的独特风貌。

1.选文编者：传统文人与新式学者

纵观民国时期初中国文教科书的选文编者，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从传统过渡到现代的传统文人，如洪北平、何仲英、吴研因、周予同、叶绍均、顾颉刚、沈颐、黎锦熙、金兆梓等人；另一类是接受了更多新式教育的新式学者，如沈仲九、孙俍工、庄适、朱经农、任鸿隽、王岫庐等人。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编者大多兼有编者、译者和读者的多重身份，他们既深受传统文化的浸染，也接受西方文明的洗礼，作为中西文化结合的知识分子，在新与旧、东与西之间坚守革新。因此，他们一方面按照一定的选文标准，从英国、法国、德国、印度、俄罗斯、芬兰、丹麦等国家，精选并翻译了一系列涵盖了政治、法律、哲学、军事、文学、艺术、科学、教育等的经典文学作品，旨在拓宽学生的知识视野，以及宣传新思想和新文化；另一方面对于近代中国的衰弱，他们也有着切肤之痛，其普遍认为：“中国之弱，由于民愚，民之愚，由于不读万国之书，不知万国之事也。”[①] 这句话表明他们已经认识到民愚的原因。因此，他们试图通过在初中国文教科书中选录适宜的价值观念的选文来启蒙青年一代，以便培养具有世界眼光和民族灵魂的时代新人。

2.选文作者：历代名家与时贤新秀

国文教科书的选文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载体，既精确呈现了先民的智慧结晶、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还生动地传递了时代的伦理诉求和审美取向。因此，民国时期的出版社在编撰初中国文教科书时，特别注重选文作者群体的多元构成，这种构成主要体现在历代名家与时贤新秀的结合上。一方面，教科书从《诗经》、诸子百家经典作品、《史记》《汉书》、唐诗、宋词、元曲、清小说中广泛选取名家的经典作品（节录），来向学生展示灿烂辉煌的传统文化，旨在培养他们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与敬畏之情；另一方面，教科书还精心挑选了当代新人揭示社会现实的时文之作，如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鲁迅的《故乡》《孔乙己》、朱自清的《背影》《荷塘月色》、冰心的《寄小读者》、叶圣陶的《稻草人》等时贤作品。这些作品不仅反映了社会现实，而且还展现了时代精神，实现了与时代潮流的多维对话。例如，《少年中国说》以激昂的文字激发了青年一代的爱国热情和进取精神；而鲁迅的《孔乙己》则以犀利的笔触揭示社会底层人民的苦难和封建礼教的束缚。这种多元化的选文策略，既可以让学生在经典中汲取历史的智慧，也在让他们在时文中感受社会的脉动，激发他们对国家命运的思考和对民族未来的担当。

（二）选文理念的时代呼应

选好课文是保证教科书质量的关键。[②] 一篇课文要选入教科书，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民国时期，初中国文教科书的编者基于对时代主题、社会现实及教育宗旨的理解，选入了体现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化的文学作品，旨在启迪学生的新知和培育他们的新德。

1.选文标准：普及教育与开启民智。民国时期，初中国文教科书的编写者多为接受了新式教育的传统

---

①梁启超：《戊戌变法记》，见张品兴：《梁启超全集：第一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194页。

②顾振彪：《关于语文教科书的选文问题》，《语文建设》2007年，第Z1期。

文人，他们深刻理解现实的社会，怀抱着构建新知、开启民智的编写理念，在教科书的选文编写中不断探索创新。第一，在对待文言与白话的选文时，编者们更倾向于选择新式的白话文。因此，这一时期的教科书在选文的编排上或全篇采用白话文，或文白兼选，但皆以白话文为主，如《基本教科书国文》《初级中学国文》和《朱氏初中国文》等均是这种设计。这些选入的白话作品从不同的角度对新时期、新社会做了全面清晰的阐述，意在打破民众的旧有观念，建构新的认知世界。第二，在描绘西方社会的文明时，编者主要摘录作者旅行见闻的游记。如《白话文范》中选入梁启超的《巴力门逸语》《欧游心影子录楔子》《亚尔莎士洛林尔州纪行》《威士敏士达寺》等相关文章，这些作品从不同层面为学生描绘了同时期欧洲国家的政治文明进程。

2.选文取向：批判传统与培育新德。民国时期，由于民主科学的观念猛烈冲击着旧传统、旧礼教和旧制度。因此，这一时期的初中国文教科书在选文上也更倾向于选择反映民主自由、男女平等和个性解放的时代作品。第一，通过批判封建传统道德，来揭露旧社会的黑暗残酷。如《初中国文教本》选入胡适的《李超传》、周树人的《孔乙己》、葛洪钧的《大家族的弊害》等作品，皆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底层人物的悲惨命运，旨在揭示封建社会的吃人本质。第二，选辑摘录反映新道德的文章，让学生在理解现实社会的同时，思考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如《新学制国语教科书》中选入蔡元培的《舍己为群》从战争、革命、真理等视角，论述人只有努力融入群体之中，舍己为群，才能更好地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①] 宗淹的《少数人的责任》指出我国政治混乱、不是因为国民程度幼稚、不是因为政客官僚腐败，不是因为武人军阀专横，而是因为少数人没有责任心，没有负责任的能力。[②] 此外，还有部分歌颂女性精神的选文，如王闿运的《费宫人传》、陆次云的《直辞女童》以及胡愈之的译文《文明的曙光》等。

（三）选文编排的科学设计

民国时期，初中国文教科书的编写者，始终将科学系统的编排作为选文设计的基本原则，并在选文体例、选文系统、选文内容和选文体裁等方面不断探索教科书编撰的新规范和新秩序。

1.选文体例：文白混编与助读系统。民国时期，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出版技术的革新，教科书的选文编辑体例在继承前人经验的基础不断发展变革，逐渐日趋成熟完整。第一，文白混编的选文系统。民国时期，初中国文教科书的选文系统，先后经历了文言为主、文言混编和文言合编的三个阶段，尽管在不同阶段的占比有所不同，但是初中国文教科书中文白兼采的这一理念，却始终从未动摇。其中，文言文主要选取反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的经典篇章，如《左传》《诗经》《战国策》《史记》《唐诗》《宋词》等；而白话文的选择则更注重撷取那些反映时代精神和时代气息的新式文体，如胡适、冰心、周树人等人的诗歌、散文和小说等。第二，持续完善的助读系统。在192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现代初中国文教科书》中，助读系统的注释就得到了大量的使用，有些选文注释甚至多达30多条；随后，在1929年世界书局出版的《初中国文》中，助读系统除了对相关的生词、术语、典故、引文、地名进行注释之外，还在每篇选文后设置了二到四则习题；而在1933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初中国文读本》中，助读系统不仅对选文的注释和习题进行了丰富和拓展，而且还增加了说明内容概要的题解、记叙作者文学地位的生平和指示文白语句异同的语文互证等相关栏目。

2.选文编排：遵循规律与体裁多样。民国时期初中国文教科书的编写者，在将选文编进教材的过程中，不仅将选文的要素进行了全面的呈现，同时还始终遵循着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和规律。第一，遵循编排规律的选文顺序。民国时期，编者们一方面在选文内容在排列上的注重前后的呼应与衔接，如《白话文范》中第二册的前四课《洪水与猛兽》《欧战全史序》《欧游心影录楔子》《巴力门逸语》均聚焦于介绍世界上的新思想和新观念，这样编排既便于教师集中讲授，也为学生提供了课后阅读和讨论思考的空间；另一方面也充分考虑学生发展的实际需要，大量选用与社会生活、日常生活和工作生活密切关联的时代新文。这些选文以

①范祥善、吴研因、周予同：《新学制国语教科书第二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25年，第9页。

②范祥善、吴研因、周予同：《新学制国语教科书第六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25年，第312页。

实用为目的，有的属于交际方面，有的属于社会约束方面，包含日记、电报、书信、报告书、演讲稿等多种形式，有助于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完成各种体裁的写作。第二，设计丰富多样的选文体裁。选文体裁是指文学作品的具体样式，它体现了文学作品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何仲英在《国语文的教材与小说》中："将选文体裁主要划分为散文、韵文、小说、戏剧四类。"① 这些选文体裁在民国时期的初中国文中均有大量的选入，如在《国文八百课》中，既有形散神聚的记叙散文，如朱自清的《荷塘月色》、徐志摩的《我所知道的康桥》、都德的《最后一课》和许地山的《落花生》；也有充满文学性的浪漫抒情韵文，如刘大白的《水手》、郑振铎的《海燕》、臧克家的《朋友》和鲁迅的《风筝》；更有情节曲折的小说，如茅盾的《卖汽水的人》、莫泊桑的《项链》、曹雪芹的《红楼梦》中描述的"林黛玉之死"片段，以及戏剧作品，如曹禺的《雷雨》中节选的《苏州夜话》和易卜生的《玩偶之家》中描述的"娜拉离家的一幕"。这些多样的体裁以其独特的表达方式和真挚的情感，为学生提供了广阔的阅读视野和丰富的情感体验。

三、民国时期初中国文教科书选文的当代启示

民国不同时期的初中国文教科书选文真实地记录了当时国文教科书选文演变的演进历程，其选文的一些理念和经验仍然可供当前初中语文教科书的编选提供有益的借鉴和思考。

（一）构建教科书选文的多元编撰队伍

民国时期的国文教科书编撰队伍不仅体现了专业性与多元化的结合，更是在编撰机制上形成了独特的文化生态。这一时期教科书选文编撰的最大特色在于构建了一个跨领域和多层次的编撰队伍。在这其中，既包括编撰选文的编者，也涵盖时文创作的名家，它们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打造了高质量的教材选文体系。如在《复兴初级中学国文教科书》中，其选文群体主要由三部分构成，一是以胡适、傅东华等为代表的学术大家，他们凭借深厚的学养确保选文的经典性与思想性；二是以叶圣陶、夏丏尊等为代表的教育专家，他们从教学规律出发把控教材选文的科学性和适用性；三是以历代名家和当代名人为代表的选文作者群体，他们的经典作品与时代文本，共同构建了一个贯通古今的选文体系。

而反观当前语文教科书选文的编撰实践，虽然已经建立了由专家主导的编写机制，但仍存着一些问题：一是学科壁垒问题较为突出，现行的语文教材编委主要是由文学研究者、语言学家和教育专家组成，缺乏其他领域专家的参与；二是作者性别比例失衡，现行统编教材中女性作家的作品相对较少，如七年级上册仅选入了冰心的《荷叶·母亲》、于漪的《往事依依》、海伦凯勒《再塑生命的人》和袁珂的《女娲造人》等篇目；三是当代优秀作家的网络、科幻文学等作品未能纳入选文体系，使得教材内容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当代文化的发展。因此，当前语文教科书在编撰选文时，应当着力构建一个更加开放多元的编撰队伍，具体而言，主要有以下策略：其一，打破学科壁垒，邀请来自文学、历史、社会学等多个领域的专家参与选文编撰工作，在这其中，既要确保选文内容的深度性，也要丰富教材的文化意涵。其二，提高女性作家作品的选入比例，使教材选文能够更好地反映不同性别视角，进而促进文化多样性的呈现。其三，积极选取优秀作者创作的具有很大影响力的网络文学和科幻文学等新式作品，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和创造力。

（二）坚守教科书选文的时代对话功能

纵观民国时期初中国文教科书选文的演进历程，我们不难发现其不仅是一段历史文化的缩影，更是教育者与时代脉搏的深刻对话。例如，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为满足学生对于新思想和新文化的追求，各大出版机构在编选初中国文教科书时，选入了一些反映新思想和新文化的时代作品，如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钱玄同的《尝试集》等等；又如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各大出版机构在编撰初中国文教科书时，都特别注重选取那些有关国家历史、民族精神、以及英雄的传记和作品，如诸葛亮的《出师表》、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和岳飞的《满江红》等等。这种"因时制宜"的选文策略，不仅实现了教育内容

①何仲英：《国语文的教材与小说》，《教育杂志》1920年第11期。

与时代需求的同频共振，更是通过经典文本的选择与诠释，拉近了教育者和受教者之间的心灵距离。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现有的初中语文教科书选文也面临着新的挑战：一方面，时代的快速变迁和社会的深刻变革不仅重塑了社会的价值观念与文化形态，也深刻影响着学生的精神世界与认知需求；另一方面，在信息爆炸的时代背景下，海量的信息如同潮水般涌来，编者们在为学生提供前所未有的学习资源时，也带来了选择上的困惑与挑战。

面对这种双重挑战，当代初中语文教科书在选文之时，必须要建立动态的更新机制，以应对时代变迁和社会变革的深刻影响。其一，建立时代议题的监测体系。教材编撰队伍应在追踪社会热点、分析文化趋势和调研学生需求的基础上，依托专家团队和大数据技术，定期发布《语文教科书选文的时代议题报告》。该报告不仅要梳理当下最具影响力的社会议题，而且还要在评估各议题教育价值，进而为教材选文提供系统科学的筛选依据。其二，适时引入动态的选文资源。此部分可以考虑将单元内容分为长期固定的核心经典篇目和动态更新的拓展篇目。例如，在七年级下册第二单元的“家国情怀”中，可以保留《黄河颂》《谁是最可爱的人》《木兰诗》等经典篇目，同时每 2 年更新一次拓展篇目，如反映航天精神的相关时文，包括航天员的个人自述、航天科技的最新进展、航天领域的感人故事等。这种模块化设计不仅能够确保了经典作品的文化传承，而且还能使教材及时反映时代精神和社会发展。

（三）创新教科书选文的动态编排体系

通过对民国教材选文的编撰实践进行系统梳理与深入分析，可以发现其成功构建了一套精巧且具前瞻性的动态编排体系，这一体系在当时的教育环境中不仅有效突破了传统教材选文的局限，而且还在知识传授与能力培养方面展现出独特价值。例如，在 1923 年范祥善、吴研因主编的《新学制国文教科书》中，为了满足学生学习语体文的需要，教科书在第一二册中，采用了语文对译的方法，[①] 将《孟子许行章》、《桃花源记》和《新丰折臂翁》等名篇，用现代白话文逐字逐句直译，并附在其后。这种方式，既保留了文言文的原貌，又能让学生理解其深层含义。又如 1934 年夏丏尊、叶圣陶依托丰富的教学经验，在《国文百八课》中采用了一种新的编排方式，即每个单元编排一篇知识短文的形式集中明确本单元的写作知识和目标，然后以一组文章为范例来印证这些写作知识。[②] 这种“知识引导＋范例印证”的模式，不仅可以帮助学生系统掌握写作知识，而且还能通过模仿范例文章的写作实践来提升学生的写作能力。再如 1936 年夏丏尊、叶圣陶、宋云彬、陈望道编撰的《开明国文讲义》，为增进学生对文法的掌握，在第一、二册里，每隔四篇选文就设置一篇关于文法的讲话，并且文法的后面还附有练习的题目，有的是测验性的，有的是待读者自己去发展思考的。[③] 这些练习设置是对选文和文话的进一步理解与补充，旨在通过习问让学生进行深入思考，获得学习体会。[④] 这些富有创见的编排实践，既体现了编者对教育规律的深刻把握，更展现了他们与时俱进、勇于创新的教育智慧，同时为当代的教材建设也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参考范式。

然而，当我们以历史的眼光审视当下语文教科书的选文编排实践之时，不难发现，尽管单元主题式的编排结构已日趋成熟，但在助读系统层次性和数字化资源整合等方面仍存在明显不足。有鉴于此，我们可以从民国时期那些富有创见的编排实践中汲取历史经验，进而建构出一个更具适应性的动态编排体系。具体而言，可从以下两个维度进行创新突破：其一，构建包含基础、发展和拓展三个层次的助读指引。其中，在基础层，除了提供传统的字词注释和作者背景外，可增设“文化常识卡片”，来介绍文本涉及的典章制度、风俗习惯等相关背景知识；在发展层，可设计“阶梯式问题链”，从事实性问题（如“文中描写了哪些景物？”）逐步过渡到解释性问题（如“这些景物描写有何作用？”），最后提升至评价性问题（如“你如何看待主人公的选择？”）；在拓展层，可实施“1＋X”群文阅读模式，推荐与教材主题选文相关、体裁多元的延伸阅读材料，并配套设计“阅读任务清单”，引导学生进行比较阅读和批判性思考。其二，利用现代教育技术，

①范祥善、吴研因、周予同：《新学制国语教科书第二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25 年，第 2 页。

②李丽华：《我国传统语文读写结合演变与反思》，《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23 年第 6 期。

③夏丏尊、叶圣陶、宋云彬、陈望道：《开明国文讲义》，上海：开明书店，1936 年，第 2 页。

④刘凯琳：《语文教科书的互文性研究》，杭州：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 年。

建立“三位一体”的数字化教材资源体系。其一，在核心资源建设方面，对教材选文进行数字化处理，提供可检索、可批注的电子文本，并配套标准化的朗读音频和基础讲解视频；其二，在拓展资源整合方面，系统整理与选文相关的名家解读、学术论文和历史影像等辅助资源，进而形成一份以选文为中心的知识图谱；其三，在互通体验设计方面，研发虚拟实境(VR)体验、角色扮演游戏等学习形式，如让学生“走进”《荷塘月色》的月下荷塘，或“参与”《鸿门宴》的历史现场，这些形式不仅赋予了传统文本新的生命力，同时也为学生创造了一个沉浸式的学习场域。

Chinese Language Textbooks for Junior High Schools in the Republican Era: The Evolution, Experiences, and Implications

LI Tao

(School of Education, China West Normal University, Nanchong 637002,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Republican era, Chinese language textbooks for junior high schools, as a crucial medium of language education, experienced rapid development by adapting to the evolving demands of the times. The selection of texts, a key determinant of textbook quality, progressed through three distinct phases: the initial period dominated by classical Chinese,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featuring mixed classical and vernacular texts, and the consolidation period characterized by integrated classical-vernacular compilation. Throughout this process, major publishing houses meticulously considered the authorship, content depth, and structural design of the selected texts while consistently adhering to students' cognitive and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as well as fundamental pedagogical principles. These refined editorial philosophies and practical insights remain relevant today. Therefore, examining the historical progression and accumulated experiences of text selection in Republican-era Chinese textbooks may offer valuable references and insights for contemporary textbook compilation.

Key words: Republican era; Chinese language textbooks; text selection; experiences; implications

[责任编辑　治平]